



法界动态

献礼建党百年
——北京大学发布《李大钊年谱》



本报讯 记者黄洁 近日,由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和北京大学组织,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学术秘书、北京大学校史馆杨晓编著的《李大钊年谱》在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也为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提供了重要读本。

3月31日,《李大钊年谱》新书发布会暨专家座谈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北京大学校长郝平,云南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杨志强,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孙庆伟,党委组织部部长李守宁,党委宣传部部长任羽中,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仰海峰,历史学系教授张万全、欧阳哲生,以及来自政府机关、高校、研究机构和出版界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发布会。发布会由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于鸿君主持。

“陕西省公众科学素质与法治国家建设研究中心”揭牌



本报讯 记者郑剑锋 3月31日,“陕西省公众科学素质与法治国家建设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丁德科,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孙国华,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部长杨军胜出席会议,会议由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健主持。

孙国华指出,成立“陕西省公众科学素质与法治国家建设研究中心”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提升陕西省公众科学素质和促进陕西省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作为国家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学校近年来积极行动,致力于陕西省法治建设、普法教育和科普工作,研究中心成立并挂靠学校,是学校继续发挥优势服务社会的良好契机。

新华网与西南政法大学签约
共建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图为揭牌仪式 贺明 摄

本报讯 记者战海峰 3月31日,新华网与西南政法大学共建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签约仪式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

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岳彩申表示,西南政法大学作为与新华网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全国首家政法院校,一直将“立德树人、德法兼修”作为人才培养的根本理念。本次与新华网共建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就是落实这一根本理念的战略举措和重要抓手。本次双方开展课程思政共建,学校将立足学科特色和优势,积极探索打造具有政法特色、西政风格的课程思政工作体系、教学体系和内容体系,致力于成为全国政法类课程思政的示范标杆,并成长为具有政法特色、引领地位、立足西南、辐射全国的国内一流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党旗辉映百年 致敬革命先烈
——中国政法大学开展“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系列学习实践



本报讯 见习记者柳源远 3月31日,由“1502”新时代青年知行社发起,中国政法大学校团委牵头,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学生工作部联合举办的“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系列学习实践活动正式启动。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值此清明节前夕,中国政法大学举行缅怀革命先烈清明公祭,号召学校青年师生深入学习党史、坚定理想信念,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李秀云,教师志愿者服务团和“青春讲师团”等单位、团体教师代表,以及“1502”新时代青年知行社、学生会等校院学生组织、学生社团的学生代表,共计120余人参加活动。

庆历党争与石介
诈死案

法律文化

殷啸虎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为执政大臣,在宰相杜衍的支持下,范仲淹提出了整顿吏治、发展经济等方面的10项主张,实施改革,推行“庆历新政”。由于新政触动了既得利益者,因而遭到了章得象、夏竦等朝廷重臣的反对,夏竦指控范仲淹、富弼与谏官欧阳修等结为朋党。庆历新政的改革演变为朝廷内部的朋党之争,史称“庆历党争”。最终范仲淹等被免去执政之职,出任地方官,庆历新政也宣告失败。而引发这一事件的导火索,却是一个书生——北宋理学的先驱石介。

石介年轻时曾在范仲淹执掌的应天府书院跟范仲淹学习,也算是范仲淹的学生,因而对范仲淹极为尊崇。进士及第后,曾担任南京留守推官兼提举应天府书院,后又创建了著名的泰山书院,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石介性格耿直,“指切当时,是非是非,毫无顾忌”。庆历二年(1042年)经执政大臣杜衍推荐,石介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国立大学教授),“从之者甚众,大学之盛,自先生始”。他认为“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主张“息民之困”。因此,范仲淹等推行新政,石介也是大力支持,认为“此盛事也”,并写了《庆历圣德诗》,在称赞杜衍、范仲淹等的同时,暗指反对新政的夏竦等人“为大奸”,夏竦自然对他恨之切齿。对此,石介的老师孙复就担忧地说:“子祸始于此矣。”

夏竦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执政之职,

庆历元年(1041年)被任命为宣徽南院使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等,是主持西北防务、抵御西夏的统帅,韩琦、范仲淹都是他的副手,而且范仲淹还是夏竦举荐的。庆历三年夏竦被任命为枢密使(此前范仲淹、韩琦已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但因范仲淹的政治盟友欧阳修、余靖等台谏官的坚决反对,宋仁宗改任杜衍为枢密使。这样一来,夏竦同新政派的关系,更是势同水火。他看准了石介的书呆子习气,利用他政治上的不成熟,从他的身上寻找突破口。

庆历四年(1044年),石介因韩琦推荐,担任了主管集贤院的“直集贤院”一职。当时,宋仁宗对范仲淹的期望很高,范仲淹也“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与富弼等谋划新政。石介也希望他们能够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因此在给富弼的信中,直言要他“行伊、周之事”。伊是商朝的伊尹,周是周朝的周公旦,两人是辅佐周、周开国君王的著名辅臣。石介的意思很明白,要富弼学习伊尹和周公,尽心辅佐宋仁宗。

然而,这封信却不知怎么落到了夏竦的手里,他早就想利用石介构陷富弼、范仲淹等人,所以让自己的女奴暗中练习模仿石介的笔迹。现在如愿以偿拿到了石介的书信,便模仿石介的笔迹,将其中的“行伊、周之事”改成“行伊、霍之事”。霍光是汉武帝、汉昭帝和汉宣帝时的三朝元老,曾废海昏侯刘贺、拥立汉宣帝。因此,“行伊、霍之事”就暗示要富弼废立君主。同时,夏竦还伪造了石介替富弼草拟的废立诏书,并故意造谣,让宋仁宗知道了此事。宋仁宗虽然并不相信,但范仲淹和富弼却惶恐不安,为远离朝廷这个是非之地,要求外放驻守西北边关。宋仁宗开始并未同意,但范仲淹等人一再请求,便任命范仲淹为

陕西、河东宣抚使,保留参知政事的头衔;富弼也以枢密副使身份离京,出任河北宣抚使,但不久,范仲淹就被免去参知政事,改任知郓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富弼也被免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路安抚使,知郓州;韩琦被免去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宰相杜衍也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主持庆历新政的执政大臣几乎被一网打尽。当然,石介也未能幸免,他见势不妙,主动提出外放,担任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通判,未到任所,就于庆历五年(1045年)在家病逝。

然而,夏竦并未罢休,又在石介是否真的死亡一事上,引发了一场大案。当时,徐州的举人孔直温谋反被杀后抄家时,发现了他与石介之间往来的书信,据说孔直温还曾在石介门下求学。夏竦便抓住这一点,说石介是诈死,富弼暗中派他北上联络契丹起兵伐宋,富弼为内应,并请求对石介开棺验尸。执政大臣见事关重大,向宋仁宗报告。宋仁宗命提点京东路刑狱司去彻查此事,并将石介的妻子儿女监押起来。当时驻守郓州的富弼也被罢免了京东路安抚使之职。为了阻止事态扩大,时任兖州知州的前宰相杜衍和泰宁军节度掌书记龚鼎臣等具保,证明石介确已亡故。不久,富弼改任青州知州,兼任京东路安抚使,这场风波暂时平息。

两年后,夏竦被召还朝,担任了枢密使。他依然不放此事,说石介没有说服契丹发兵,又为富弼往登州、莱州等地,勾结开金矿的数万矿工企图作乱,并再度坚持要求开棺验尸,一证真偽。宋仁宗又下诏派使者处理此案。在我国古代,开棺是对死者的一种侮辱,因此御史何郯在奏章

中,直言夏竦此举是公报私仇:“夏竦岂不知石介已死?然其如此者,其意本不在石介。盖以范仲淹、富弼在两府日,夏竦曾有枢密使之命,当时亦以群议不容,即行罢退,疑范仲淹等力排揆,以石介曾替范仲淹等筹引,故欲深成石介之恶,以污忠义之臣。”提点京东路刑狱巨居简也对使者说:“今破冢发棺,而(石)介实死,则将奈何?且夜葬非一家所能办也,必须众乃济。若人召问之,苟无异说,即令结罪保证,如此亦应可应诏矣。”并让石介亲属、门人及参加葬礼的数百人联名具保,使者据实回报。宋仁宗其实对此心里也明白,于是顺水推舟,下令释放了石介的妻子儿女,石介也得以免于被开棺,一场大案就此消弭。

石介“诈死”案虽然最终不了了之,但范仲淹等推行的“庆历新政”却就此夭折,范仲淹直至去世,再也未回朝任职。

“来自何处——中国法律教育史研讨会”在华政举行

前沿观点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4月2日,由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市法学会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会、《复旦大学法律评论》协办的“来自何处——中国法律教育史研讨会”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举行。四十余位学者相聚于圣约翰大学原址,交流中国法律教育史研究的最新动态,探讨并比较近现代公立、私立法政学堂(学校)以及法律院系的起源和变迁、经验和教训。

在主旨演讲中,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何勤华首先作了题为《近代法政教育的历史遗产》的演讲。他提出,从1841年至1949年的近代中国法政教育的遗产,应当从“内容”“精神”和“主体”三个维度进行把握。在内容上,“西学东渐”背景下建立的各类法政学校和法科为现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精神上,不畏艰难、艰苦创业,忧国忧民、独立自主,是近代法律人共有的品质;在主体上,大多数法科知识分子的骨气与坚守,至今仍是我们的榜样。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伟在题为《宁波法政学堂疑难点实证》的演讲中,对于学界似已定论的宁波法政学堂是近代中国事实上的第一所私立法政学堂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仁善在《国立中央大学法科教育回眸》的演讲中,从历史沿革、师资队伍、教研活动、社会声誉,回顾了国立中央大学法科教育尽管起步较晚,但起点很高,曾引领民国公立法科教育潮流,同时也烙下了深刻的时代印记。

“专题研讨”由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屈文生主持。清华大学副教授陈

新宇在《事不过三——清华法律学系的三次筹建始末》的发言中,介绍了清华大学法律系在1929年至1934年、1946年至1949年、1995年至1999年的三段筹建史,认为国家政策、校方态度和个人作为这三个方面对于法科的创建和发展不可或缺。同济大学教授陈颐分享了法律人胡元义、胡应华和徐道邻的同济岁月,并介绍了20世纪40年代同济大学法科的立与撤。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袁哲在《法科留学生的分化与青年党的成立》的发言中,分析了百年前的留日法政生与青年党的关系。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沈伟从法学知识垄断化、大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案例,介绍了近代法学函授教育的兴与衰。上海海事大学陈刚博士在发言中,细述一代海商法大家魏文瀚的人生履历,展现了海商法学科在中国的创立和变迁。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方潇,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王旭和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洋,分别就史料把握、材料衔接和论述角度等问题作了精彩的评议。

“与谈及讨论”环节在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于明的主持下,7位青年学者围绕各自提交的论文展开了论述。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王伟臣以持志大学的“前世今生”为焦点,介绍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教育的历程;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李明倩回忆采访十多位台湾法律界前辈、撰写《中华法学家访谈录》的过程,及自己对于台湾地区一代法律者精神风貌的感观;浙江财经大学龚金镛博士以近代宁波

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法学教育根基之形成的关系,对于王伟教授的主旨演讲作了回应;浙江大学梁兆星博士以课程设置、历史进程和政治变动为视角介绍了浙大光华法学院的建设;绍兴文理学院姜增博士以日记和私人档案为基础,分析了民国司法派系划分薄弱、个人关系浓厚之成因;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杨立民博士分别从职业身份、业务范围、监管机构等角度,分析在实践中各国对于外国律师的准入机制及中国目前的困境和对策;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龚瀚晰博士以刘师舜、漆竹生为切入,分析了留日和留欧这两类民国法政学子的人生境遇及近代中国法政教育史变迁中的必然与偶然。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沛在总结中指出,可从机构史、部门法史、法律人的历史、法律教育的方式以及地方的法律教育史等方面拓展中国法律教育史的研究,机构史包括法学院、法律系的历史,部门法史应当区别于各学科内的视角,地方法律教育史研究应当分地域进行讨论,如果能够从地域研究中抽象出共性的特点而非仅仅是史料的堆积,中国法律教育史的研究将大有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田雷认为,会议通过对法政学校、法律系和人物的研究和发掘,显示出中国法律教育史的论述具备一定的连续性,对人物、机构和地域的研究或许可以跳出固定的框架,这也将有助于法律史研究走出自身的局限。

清正忠义颜真卿

史海钩沉

孟书记

说起颜真卿,就不得不提到其家族先人颜之推。颜之推生活在南北朝乱世,先后在南北朝梁、西魏、北齐、北周、隋朝做官,目睹了无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故事。命运的多舛让颜之推对历史与人生有了更为深刻的思索,他将自己的乱世经历与感悟,汇聚到家风这一点上,记录在《颜氏家训》里,用来教导儿子,警示子孙。

在《颜氏家训》的指导下,颜氏子孙几乎个个注重才学与操守。出生在这样家庭的颜真卿,对各种邪门歪道、投机取巧有着天然的免疫力,这点,从他学书法的故事中可见一斑:

为了精进书法,颜真卿专门去拜访著名书法家张旭请教写字的秘诀。第一次去请教的时候,张旭只哈哈一笑,说:“书法哪有什么秘诀!多写多写再写,自己就悟出来了!”颜真卿听了张旭的话,老

立文艺太守的人说,降低安禄山的警惕性。

终于,“渔阳鼙鼓动地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造反,河北二十四郡官军几乎都吓破了胆,降的降,逃的逃。只有颜真卿治下的平原郡,顽强抵抗,并派出使者快马加鞭赶到长安报告情况。接到消息时,唐玄宗不禁感慨:“朕不识颜真卿形状如何,所为得如此!”

趁安禄山长驱直入,后方空虚之时,颜真卿毅然起兵反抗,一时间河北诸郡纷纷响应。颜真卿的哥哥,常山太守颜杲卿也在义军之中。就在形势大好之际,唐朝内部一些将领却各怀鬼胎,手握重兵却坐视河北义军而不救。没过多久,颜杲卿因孤立无援而被叛军击败,被残忍的杀害。一同殉难的还有颜氏家族三十余人,包括颜杲卿的儿子颜季明、外甥卢逵等。

噩耗传来,颜真卿悲愤异常,却又无暇顾及,因为他要继续抵挡那气势汹汹杀回来的叛军。直到两年后,颜真卿才得以抽出身来,派人寻访家亲人的下落。将颜杲卿、颜季明和卢逵归葬安风栖原祖莹,并写下了著名的《祭侄文稿》。

在书写此文时,颜真卿椎心泣血,极度悲愤,根本无法刻意经营笔墨,依靠的纯粹是平日书法功力的自然流露,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篇

边下笔边措辞,涂涂抹抹的作品,竟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他更想不到的是,在这之后,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他。

公元782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造反。当时的宰相卢杞与颜真卿不和,居然上奏:“颜真卿四方所信,使谕之,可不劳师旅。”怂恿唐德宗下诏,让颜真卿去劝降李希烈。唐德宗居然一口答应。诏令一出,满朝皆惊。大家都知道,对于颜真卿来说,这意味着有去无回。

已年近八十的颜真卿,心中自然比其他人更清楚这一点。只是,他一生忠于大唐,哪怕前路凶险莫测,也义无反顾。

到达淮西后,面对李希烈的屡次威胁,颜真卿不屈不挠。在囚牢中,他准备好了遗嘱、墓志、祭文。数月之后,被李希烈杀害。

颜真卿在《颜氏家训》的训诫下成长起来,最终又以自己的生命向世人诠释了其平实家训所蕴含的大义。这种精神也潜藏在了他所开创的颜体之中:其书端正、雄厚,透着一股凛然不可侵犯之气,其人刚正忠烈、坚贞不屈,两者仿佛浑然一体。无怪乎欧阳修评价:“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像其笔画。”